

西方人东来之后

——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

龚缨晏 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WHEN THE EAST MET WEST

西方人东来之后

——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

龚缨晏等 著

本书为浙江大学211工程项目、『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课题成果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人东来之后：地理大发现后的中西关系史专题研究 / 龚缨晏等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3

ISBN 7-308-04667-2

I. 西... II. 龚... III. 中外关系 - 文化交流 - 文化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278 号

西方人东来之后

龚缨晏等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黄宝忠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1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667-2/K·15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郑和与哥伦布:相反方向的航海者	1
第一节 郑和的海外航行	3
第二节 哥伦布的“印度事业”	11
第三节 郑和与哥伦布	20
第四节 历史的启示	33
第二章 汉语:欧洲人的早期认知	51
第一节 16 世纪中后期葡萄牙、西班牙人对汉语的认识	51
第二节 早期东来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	61
第三节 欧洲本土学者的早期汉语研究	84
第三章 历算之学:中国人的理解	120
第一节 西方历算学的东传与中西历算学互动的展开	120
第二节 西学中源——中西历算学互动之背景	127
第三节 西算中算化——中西历算学互动之取向	159
第四章 美国:大洋彼岸的奇异国度	184
第一节 裨治文在中国	184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写作、出版和内容	205
第三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传播与影响	227
后 记	263



第一章

郑和与哥伦布：相反方向的航海者

1492年8月3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远航,10月12日首次登上美洲。哥伦布坚信他来到了亚洲东部地区。实际上,这是一块欧洲人前所未知的新大陆。

1488年2月,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首次航行到非洲最南端,找到了由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通道。1497年7月,达·伽马率领船队从里斯本起航,11月绕过非洲南端。他们横渡印度洋后,于1498年5月到达印度的西海岸。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打开了通往中国的海上门户。1513年,一个名叫欧维士(Jorge Álvares)的葡萄牙人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来到广东沿海。他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个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①此后,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不断增多。

1519年9月,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环球航行。1520年11月,他们穿过了南美洲南端的海峡(后人称之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麦哲伦舰队抵达菲律宾,与中国隔海相望。

这样,进入16世纪,欧洲人通过海上航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来到中国沿海地区: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越过印度洋,自西向东而来;西班牙人绕过美洲越过太平洋,自东向西而来。中国“被包围了”(China besieged)。^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直接与西方进行交往,并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到由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社会因此而受到西方日渐强烈的影响,终于,三百多年以后,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的进程被欧洲列强的炮火彻底打断,完全脱离了原先的发展轨道,被强行拖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航线中,并且不得不按照一种

① 路易士·凯尤:《欧维士,第一个到中国的葡萄牙人》。

② 这是赫德逊(G. F. Hudson)所著《欧洲与中国》(Europe & China)第8章的标题。

源自欧洲的全新规则一步一步地前进。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这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有过多少的屈辱与悲哀,有过多少的抗争与呐喊,有过多少的希望与无奈。透过使人眼花缭乱的刀光剑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上,洒满了鲜血与泪水,裸露出白骨与头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整个社会几乎都在疯狂的时候,有人却在静静地思考着;当一批又一批最卑鄙无耻的奸诈之徒在人生舞台上尽情表演的时候,有人却在默默地探索着;当有人在穷奢极侈中恣意践踏着人类灵魂与尊严的时候,有人却在清贫与淫威下苦苦地守护着自己的良知。由血肉铸成的“中国的脊梁”是如此的崇高坚强,正是因为有了它,这个民族才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在迎着风雨不断向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艰难地走向世界,只不过更加自信了。

自从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开辟新航路后,地球不同的地区开始被连在一起,整个世界历史也都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写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 近来,国外有人把 1500 年开始到 1800 年为止的历史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②,而且这股浪潮后来变得越来越汹涌,势不可挡,发展到今天,席卷世界各个角落,谁也无法置身于外。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的东来,而不是中国人的西航呢?事实上,早在哥伦布之前近一个世纪,中国航海家郑和就已经率领过庞大的舰队进行过海外远航。就技术条件而言,郑和时代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从而发现新航路。^③ 这样,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为什么郑和没有继续远航呢?为什么最先揭开地理大发现序幕的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呢?如果是郑和发现美洲、完成环球航行的话,会对世界历史产生与哥伦布同样的影响吗?中国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发生质变,先于欧洲进入近代社会,并率先完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73 页。

② 根据 G. C. Cunn 所著 *First Globalizations*, 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是指哥伦布、达·伽马发现新航路后,随着欧洲的扩张,亚、非、欧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联系,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上的往来。参阅该书,第 15 页,注 1。

③ 英国退役军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其所著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中提出,郑和船队不仅绕过了非洲进入大西洋,而且还到达了美洲与澳洲。但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参阅金国平、吴志良:《郑和下西洋葡萄牙史料之分析》;张施娟、龚纓晏:《〈毛罗地图〉与郑和船队》。

现代化?^①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近代中国的启蒙者梁启超就将郑和与哥伦布作过一番比较。^② 2005 年恰逢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所以我们还是以郑和与哥伦布为例,再来探讨一下上述这些问题,希望会有一些新的启迪。

第一节 郑和的海外航行

郑和,俗称三保(或三宝),原姓马,出生在云南昆阳(今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中。其祖先原是中亚布哈拉的贵族,可能还与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有某种渊源关系。^③ 1218—1223 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西征时,郑和的祖先赛典赤“率千骑以文豹白鹞迎降”^④,跟随西征。1274 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派赛典赤出任云南省平章政事,这个家族因此来到云南。赛典赤治理云南很有政绩,死后被追封为咸阳王。郑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是穆斯林,并且都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圣过,所以被尊称为“哈只”(意为“师尊”、“巡礼人”)。^⑤

1368 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1381 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等人率领大军攻打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第二年平定云南。“明军在战胜元军后,有把当地儿童掳去服役的风气。在消灭元军的战役中,郑和是不幸被掳去的儿童中的一个。”^⑥ 郑和被送到南京的宫廷中,成为小太监,后来被赐给远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在燕王府中服务。^⑦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1398 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由于朱允炆的年号是建文,所以人们常称其为建文帝。建文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打击那些正在扩张势力的藩王,并准备向拥兵自重的燕王朱棣开刀。朱棣闻讯后,于 1399 年打出“奉天靖难”的旗号,在北平起兵,进攻南京,这就是著名的“靖难之役”。经过四年战争,朱棣于 1402 年六月攻入南京,从其侄儿手中夺得皇权,做了大明王朝的皇帝,是为成祖。由于他的年号是永乐,所以常被后人称为永乐皇帝。至于建文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 480 页;兰德斯:《国富国穷》,第 120—121 页;罗荣渠:《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John W. Cell,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1450—1700。

②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③ 李士厚:《〈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邱树森:《郑和先世与郑和》。

④ 《元史》,第一百二十五卷,赛典赤赡思丁传。

⑤ 觉明(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李士厚:《郑和的伟大贡献与其家世渊源》。

⑥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 9 页。

⑦ 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帝的最后下落,一直无法确证。有人说他逃走了,有人说他死于宫廷的大火中。

郑和从小就被送到燕王府中服侍朱棣,与朱棣的私人关系很密切。在朱棣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郑和也跟随出征。特别是在1399年底的郑村坝(今北京东郊的东坝村)战役中,表现出色。朱棣当上皇帝后,论功行赏,特地赐给他“郑”姓,以表彰他在郑村坝战役中的战功。^①从此,原先燕王府中的小太监马和就成了永乐皇帝的“内官太监”。^②

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郑和以“钦差总兵太监”^③之类的名义,受明朝皇帝的委派,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沿海,^④单程航线超过7300海里。^⑤郑和每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都在27000人左右,包括外交官员、水手船工、护航军人以及后勤人员等。郑和船队是一支由200余艘各种船只组成的“特混船队”,其特点是:船员众多,建制完整;船舶巨大,种类齐全;编队严密,通讯便捷。^⑥根据明代罗懋登所撰的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介绍,船队中的船只可以分为五大类: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其中最大的称为“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⑦。史料记载说它长44丈(约140米),阔18丈(约57米),据此推算,其排水量当在23000吨左右,^⑧甚至可能高达3万吨左右,^⑨可以乘坐上千人。^⑩如果真有这么大的话,那么,郑和宝船可以说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⑪。

郑和宝船如此巨大,使不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许多人为之赞叹。孙中山先生把郑和下西洋称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⑫。不过,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人对于宝船的大小提出过种种怀疑。^⑬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郑和时代“不存在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海船,因为这样的船既不需要也无可能”,

① 《郑和家世资料》,彭德清所作“序言”,第2页;谢方:《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② 李至刚:《马公墓志铭》,参阅《郑和家世资料》,第1页。

③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7页。

④ 金国平、吴志良:《郑和航海的终点——比刺及孙刺考》。

⑤ 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

⑥ 孙光圻:《海洋交通与文明》,第222—227页;《中国古代航海史》,第489—497页。

⑦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

⑧ 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

⑨ 杨宗英、黄根余:《浅论郑和宝船》。

⑩ 《中国古代造船发展史》编写组:《郑和下西洋与我国明朝的造船业》。

⑪ Louise Levathes(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第78页。

⑫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88页。

⑬ 各种主要观点可参阅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第64页。

郑和宝船的长度应为18丈(约62米),宽度为4丈4尺(约15米),排水量在1200吨左右,平均每艘可以载五六百人。^①即使如此,郑和船队也是15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皇帝组织的一种官方活动。为了进行这项空前浩大的活动,明朝政府组织调动了全国的力量,正如《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说的:“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才方够用。”^②郑和下西洋所需船只,是在南京、福建等地的官办造船场中建造的,“据《明实录》中不完全的记载作一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之间,由明朝政府下令建造和改造的海船,就达2718艘之多”^③。其中有许多直接说明是为了下西洋而建造的。造船厂的工匠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来的。曾于16世纪中期主持过龙江船厂的李昭祥在其《龙江船厂志》中说:“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造船。隶籍提举司,编为四厢。”^④造船所需的原料,也是由官府调拨供应的。郑和下西洋时所携带的各种货物,主要是由明政府官办工场生产的,还有一些则以官买的形式向民间征购。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官买实际上“包含某些强迫硬拿的成分”,是向人民进行“榨取和剥夺的”一种形式,不能等同于正常的商品交换。^⑤官办工场生产出来的货物,以及通过官买从民间获得的物品,集中存放在官方仓库中,需要时支取。^⑥包括郑和在内的下西洋官员,都是政府委派的外交人员。他们乘坐的船只,就是国家的海军船队,护送郑和他们的则是海军官兵。

为什么明成祖要如此不惜工本地组织浩大的船队出使西洋呢?其目的何在呢?对此,历来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朱棣是为了到海外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以免他日后卷土重来威胁自己的皇位。这种说法在明朝就已出现了。朱棣死后二百多年,社会上还有此类传言:“遣太监郑和浮海,遍历诸国,而终不得影响。”^⑦甚至清代官方所修的正史也半信半疑地写道:“成祖疑

① 杨樵:《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船舶》;杨樵、杨宗英、黄根余:《略谈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杨宗英、黄根余:《浅论郑和宝船》;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第67页。

② 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上卷,第153页。

③ 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

④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第三卷,官司志,第92页。

⑤ 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

⑥ 巩珍《西洋番国志》所保存的三封敕书,就是郑和下西洋时支取货物的凭证。参阅巩珍:《西洋番国志》,第9—10页。

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一卷,建文君出亡,第10页。

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① 第二种观点采纳了《明史·郑和传》中的后半句话,认为明成祖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达到使海外各国敬畏中国的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对付中亚新兴的帖木儿帝国,“即对帖木儿帝国示威”^②。第四种观点认为成祖主要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是要打开一条通向西洋的海上航道,发展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③ 第五种观点认为明成祖并非出于经济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想通过发展与海外各国的政治联系,造成“万国顺服”的盛况,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其间,即使有一些贸易活动,也是从属于政治目的的。^④ 最后一种观点,则综合诸家说法,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提高朱棣的个人声望。(2)耀兵异域,宣扬国威。(3)迎合宫廷权贵追求异域珍稀宝物之欲望。(4)发展海外贸易,繁荣国内经济,以增加国库收入^⑤;甚至“可能还有牵制帖木儿帝国的用意”^⑥。也有人总结说:“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一个是开展官方的海外贸易,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⑦

在我看来,上述第五种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朱元璋在去世前留下的遗诏中清楚地说,要把帝位传给朱允炆:“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⑧ 朱允炆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明成祖以武力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得帝位,在封建时代的臣民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以庶篡嫡,有悖于传统、法统与皇统。朱允炆上台后,比较开明仁和,这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原先一直战战兢兢生活在朱元璋淫威下的大臣们顿时如见天日,并衷心拥戴建文帝。当朱棣率领大军进入南京时,虽然建文帝朝廷中的大臣们多数都很识时务地投降归顺了,但也有像方孝孺这

① 《明史》,第三〇四卷,郑和传。

② 向达:《试说郑和》。

③ 主张这种观点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李金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终止与历史回顾》。

④ 这方面的论著甚多,近年来主要有朱晨光:《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章深:《试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杨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洪焕春:《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孙光圻:《论明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晁中辰:《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黄顺力:《海洋迷思》;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陈尚胜:《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

⑤ 姚楠等:《七海扬帆》,第181—183页。

⑥ 晁中辰:《明成祖传》,第324页。

⑦ 陈高华等:《海上丝绸之路》,第108页;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第195—196页。

⑧ 《明史》,第三卷,太祖本纪三。





样一些宁死也不愿承认朱棣的忠臣。即使那些口口声声表白归顺的降臣,是否真是口服心服,也是大成问题的。对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问题,明成祖心中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一方面通过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反抗者,甚至出现了像“瓜蔓抄”之类的血腥屠杀;另一方面,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一系列好大喜功的行为,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非凡政绩,以此来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英明君王,只有他才配得上做大明帝国的皇帝,只有他才是天命所归。于是,我们看到他营建北京城,疏浚大运河;“三千文士修大典”,大兴土木筑寺观;五次出兵征漠北,八十万大军下安南。郑和下西洋,正是这一系列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获取皇位的方式以及其个人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是明成祖个人喜好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正是因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以非法的方式登上了皇位,所以明成祖上台后,就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朱元璋的合法继承者,以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包括把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在对外关系上,明成祖急切地希望通过获得邻邦的正式承认来加强其在国内的地位。在《明成祖实录》中就有不少记载: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丁亥,“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刺、占城诸国。上谕礼部臣曰: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①。

永乐元年(1403)八月丁巳,“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须有官专至(应是“之”之误——引者),遂命吏部依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司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②。

永乐元年九月己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国遣使人贡,已至宁波府。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令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刀槊之类,籍封送京师。上曰: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有资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至刚复奏:刀槊之类,在民间不许私有,则亦无所鬻,惟当籍封送官。上曰:无所鬻,则官为准中国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

① 《明太宗实录》,第十二卷,第205页。

② 《明太宗实录》,第二十二卷,第409—410页。

归慕之心”^①。

永乐元年十月辛亥,“上谓礼部臣曰: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远人来归者,悉抚绥之,俾各遂所欲。近西洋回回哈只等,在暹罗闻朝使至,即随来朝。远夷知尊中国,亦可嘉也。今遣之归,尔礼部给文为验,经过官司毋阻。自今诸国番人愿入中国者,听”^②。

永乐二年(1404)五月甲辰,“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琉球国山东王遣使贡方物,就令赍白金诣处州市瓷器,法当逮问。上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③。

从上面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1)成祖上台后,迫不及待地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者,宣布中国的皇帝已经更换,他才是中国的合法皇帝。(2)他热切地希望外国君主能够承认自己是中国皇帝,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恢复市舶司。(3)外国君王只要能够前来朝贡,即使违反一些中国的禁令,也是可以容忍的。朱元璋在位时,对于那些自称前来朝贡的外国人还是有比较严格的审查的,“凡是发现有可疑之处,则不予接待。在永乐年间,则从未见到因发现贡使之伪而拒之门外的事例”^④。(4)他采取这些对外政策,往往打着朱元璋的旗号,以此来说明他所执行的是朱元璋的政策,他是朱元璋的真正继承者。明成祖在位时,向周边国家派出了大量的使节进行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只是其整个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明史》所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⑤,“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⑥。而所有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政治性的,而不是为了经济上的获利。

在《郑和家谱》中,保存着永乐七年(1409)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所携带的明成祖颁给海外各国的诏书:“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祇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⑦ 这份诏书的意

① 《明太宗实录》,第二十三卷,第426—427页。

② 《明太宗实录》,第二十四卷,第435页。

③ 《明太宗实录》,第三十一卷,第556页。

④ 晁中辰:《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

⑤ 《明史》,第三百三十二卷,西域传四,坤城。

⑥ 《明史》,第三〇四卷,侯显传。

⑦ 《郑和家世资料》,第2页。



思是非常清楚的：(1)宣告成祖是中国的新皇帝，并强调是皇位的正统继承者。永乐十年(1412)成祖在颁给锡兰国王的诏书中，一开首也强调“朕统承先皇帝鸿业”^①。(2)成祖既是中国的君主，也是天下的君主。(3)希望海外各国能够和平地生活。(4)欢迎海外各国前来朝贡。郑和自己在福建长乐所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中也写道，皇帝派他下西洋的任务就是政治上的“宣德化而柔远人”，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贄，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贄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②

当然，要想吸引外国人远涉重洋前来朝贡，仅有“仁义”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经济上的实际利益。对此，明成祖心中很清楚：“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都携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金银、铜钱等，其中一部分就是“给赐各番王人等”的。^③王士性在讲到南京大报恩寺的来历，曾记载说：“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勅侍郎黄立恭建之。”^④那些前来中国朝贡的外国君主及使臣，都带有一定数量的土特产作为贡品献给明朝皇帝，但是，明朝政府给予他们的“回赐”更加丰厚，其价值大大超过贡品，以此显示中国作为宗主国的慷慨大度。朱元璋曾对礼部官员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⑤他将这种经济上亏本的往来称为“厚往而薄来”^⑥。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朱元璋对海外国家的朝贡进行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明太祖实录》记载说：“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⑦明成祖对外国贡使的赏赐更大方。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领 540 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中国。回国时，明成祖仅赐给国王的礼物就有“金镶玉带一，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二百六十万，锦绮纱罗三百匹，绢千匹，浑金文绮二，织金通袖膝襴二”^⑧。而且，明成祖明确批示，与外国人交往，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手段，绝对不是为了贪图经济上的利益。《明史》记载说：“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九卷，第 312 页。

②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 42 页。

③ 巩珍：《西洋番国志》，敕书，第 9 页。

④ 王士性：《广志绎》，第二卷，第 23 页。

⑤ 《明太祖实录》，第一百五十四卷，第 2402 页。

⑥ 《明太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 1314 页。

⑦ 《明太祖实录》，第二百三十一卷，第 3373 页。

⑧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七十七卷，四夷来朝之赏。此次代表团人数，见《明史》，第三百二十五卷，外国六，满剌加。

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①

郑和下西洋时，每到一地，先宣读中国皇帝的诏谕，接着向当地的统治者颁赠赏赐，然后进行一些贸易活动。但相对于政治外交活动而言，这些贸易活动是次要的、从属的、附带的。我们不能将主次颠倒。郑和下西洋采购回来的多是些奢侈品，“明月之珠，鸦鹖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②。这些奇珍异宝虽然稀罕，但并非普通民众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大量地进口之后，就消费不掉了，出现了过剩。明政府只得将这类番货强行搭配给文武官员，充抵他们的俸薪，^③结果引起官员们的不满。也许明朝政府可以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某些经济利益，但是与郑和下西洋巨大的开支相比，这种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投入大大超过了产出。当时就有官员指出：“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缎、铸铜钱，遣内官赍往外藩，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费中国，糜弊人民，亦莫甚于此也。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此可谓失其宜矣。”^④成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下西洋是一种经济上赔本的活动。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成祖刚将首都迁到北京才几个月，皇宫中的奉天殿等三个宫殿着火，成祖下诏要求大臣们直言施政中的过错，有些大臣乘机提出下西洋实在劳民伤财，要求停止，有的批评意见相当尖锐，引起了成祖的不悦，结果被成祖关入牢中。^⑤不过，成祖还是把下西洋当作“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者”^⑥给停止了。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有宦官为了讨好宪宗，建议效仿成祖，再次组织下西洋。兵部尚书项忠命人到档案库中查找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结果找不到。项忠“笞吏，复令人检三日，终莫能得”。因为这些档案资料早已被一个名叫刘大夏的官员给藏匿起来了，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无哉！”^⑦从此，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下西洋之类的活动了。因此，如果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初衷是为了经济上的利

① 《明史》，第八十一卷，食货五，市舶。

②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校注》，自序，第7页。

③ 明政府将番货折抵俸薪的情况，参阅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第152页，表3-3。

④ 邹缉：《奉天殿灾疏》。

⑤ 《明史》，第一百四十九卷，夏原吉传；第一百六十四卷，邹缉传。

⑥ 《明太宗实录》，第二百三十六卷，第2266页。

⑦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第八卷，第307页。

益,那么他就一定会遵循经济规律,至少不要赔本,而绝对不可能违背经济规律去做无利可图、得不偿失的事情。正因为郑和下西洋是一项政治性质的外交活动,所以明成祖才会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以巨大的经济代价一次又一次地派遣郑和出使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朝贡贸易的一种独特的形式,也是朝贡贸易发展的高峰。朝贡贸易的特点是,一方面,把海外贸易活动严格地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①;另一方面,实行严厉的海禁,禁止民间出海贸易。朱元璋时,已经一再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②,明成祖不仅继承了禁止私人出海贸易的政策,而且还进一步加强。在他登位后的第二个月,即宣布:“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③更绝的是,他于永乐二年(1404)发布诏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④。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造船业、海上运输业和海外贸易。在明成祖派出官方使臣大规模出使西洋的时候,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却遭到了残酷的扼杀。郑和下西洋,是官方的活动,与民间没有关系。正是由于它并非根植于民间的沃土中,所以,它缺乏长久的活力,昙花一现之后,就永远地消失了。

总之,郑和下西洋,是政治性质的外交活动,而不是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它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与明成祖的政治意图及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动力来自明朝皇帝的推动,而不是来自社会内在的发展需求。因此,明成祖死后不久,下西洋的壮举也就很快停止了。

第二节 哥伦布的“印度事业”

郑和下西洋之后半个多世纪,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于1492年8月首航美洲。

哥伦布1451年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下层市民家庭,其父亲主要从事毛织业,拥有一台或几台纺织机,虽然不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雇佣工人,但

① 《续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市余考二,市舶互市。

② 《明太祖实录》,第一百三十九卷,第2197页。

③ 《明太宗实录》,第十卷上,第149页。

④ 《明太宗实录》,第二十七卷,第498页。

生活还是相当拮据的。^①作为家庭作坊的成员,哥伦布青少年时代曾做过梳毛工。与其他青少年一样,哥伦布在热那亚学习了识字、算术、拉丁文、会计以及一些基本的地理与航海知识。

当时的意大利四分五裂,热那亚是一个独立的城邦共和国。热那亚地处地中海中部,有着优良的港口,同时又控制着由地中海通往法国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地中海的航海与国际商贸中心。意大利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资本主义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已清晰可辨了”^②。热那亚就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的城市之一。从13世纪起,热那亚城在地中海西部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科西嘉和撒丁,并在沿北非穆斯林国家海岸还有许多基地。这个方位和这些基地把热那亚人引向大西洋。在1277年,他们与佛兰德、英格兰第一次建立直接海上联系。他们的冒险精神还把他们引向南方去寻找苏丹的黄金”^③。而1407年在热那亚成立的圣乔奇行则被视为“第一家现代化的银行”^④。

15世纪,当哥伦布出生时,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相当发达了。热那亚的公民私人集资建造船只,购置货物,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四处经商。在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北非,甚至英国都有热那亚人的居留地;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以及黑海,也有热那亚人的居留地。“哥伦布就是在这样一个重商喜利的环境中长大的,自小耳濡目染的是如何赚钱的事:买进,卖出,利率,折扣,佣金,利润。”^⑤不过,哥伦布时代的热那亚已失去昔日的辉煌,正在急剧地衰落,这是由内、外两个原因造成的。就外因而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逐渐把热那亚商人的势力从地中海东部地区排斥出去。就内因而言,则是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并受到法国等大国的支配。这样,热那亚人的活动重心就从地中海东部地区转移到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当时,地中海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三角贸易:热那亚的羊毛织品运到西西里,西西里的麦子运到西班牙,西班牙的食盐运到热那亚。

1470年,哥伦布全家移居萨沃纳。这是一个独立的港口城市,但与热那

① 塞·埃·莫里森在其《哥伦布传》中说,哥伦布父亲的身份相当于古英语中所说的 master clothier (中译本第54页将此译作“织工主”)。改革开放初期,严中平与朱寰曾就哥伦布的家庭成分进行过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思维模式,更可以看到中国学术走过的道路。参阅严中平:《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严中平曾将此文更名为《全面否定,坚决骂倒》);朱寰:《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

② 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第565页。

③ 卡洛·M.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235页。

④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202页。

⑤ S. A. Bedini,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Age of Exploration*, p. 292.





亚在政治上有着联盟关系。在这里,哥伦布的父亲除了从事毛织业外,还经营其他一些生意。作为一名长子,20出头的哥伦布成了家庭企业的主要经营者。他作为其父亲的代理人,将货物运到外国港口出售,同时购进所需的货物。他所经营的业务,很可能是把羊毛织品运销到西班牙、北非或中东,然后购回麦子等当地物产运到热那亚等地销售。在这些经营活动中,自然离不开海上航行。这样,成年的哥伦布最早是作为一名从事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人而与航海发生联系的。但在1476年之前,哥伦布的活动区域仅在地中海地区。哥伦布这几年的贸易与航海活动,对于他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地中海上,他逐渐习惯了海盗、风暴和战争,这些都是商船的大敌。在热那亚的奴隶市场上,他看到了那些作为商品从亚洲及非洲运来的活人。在热那亚对亚洲的东方贸易中,他认识到,那些由商人们出资建立并自行治理的商埠居点,由于缺乏政府的保护,总是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危险”^①。

1476年,热那亚人组织了5条船,满载着货物从地中海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准备到英国等地去销售,哥伦布也在其中。但不幸的是,船队在葡萄牙沿海遭到法国舰队的袭击。结果,3艘船沉没。哥伦布受伤落水,最终漂游到葡萄牙海岸。从此,葡萄牙逐渐成了哥伦布的主要活动地点。

哥伦布来到葡萄牙,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因为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有生气和最先进的国家”^②,是远洋航行和海外探险的中心。葡萄牙国王搜集了大量的航海资料,网罗各种航海人才,亲自组织海外探险活动。当哥伦布来到葡萄牙时,葡萄牙人已经在大西洋上发现了亚速尔群岛等岛屿,并沿着非洲西海岸深入到几内亚湾一带。随着海外地理发现的增多,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上建立起了一种颇有特色的贸易网: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奴隶运到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卖给种植园主去生产食糖,并在那里购得食糖运回欧洲贩卖。葡萄牙政府将大西洋上的航海与贸易活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将此权利仅仅保留给本国公民。

1479年,哥伦布与一个葡萄牙贵族小姐结婚,并获得葡萄牙公民权。这样,哥伦布就可以致力于在大西洋上的航海与贸易活动了。15世纪80年代,哥伦布曾远航到非洲西岸的几内亚湾。通过广泛的航行,哥伦布掌握了有关大西洋潮流、风向、气候、天文方面的知识,为他后来的远航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经验。

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哥伦布还与其弟弟一起开过一家制作航海图的商店。

① S. A. Bedini,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Age of Exploration*, p. 174.

② 塞·埃·莫里森:《哥伦布传》,上卷,第75页。